

志书所见安岳石刻略考

汪 毅

提 要：四川安岳石刻造像数量达数万尊，以佛教造像为主，兼及少数道教造像和儒释道三教或佛道合龕造像；以唐宋时期的为主，具有上承北方石刻，下启大足石刻的重要地位。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8处（均为石刻造像），有“古、多、精、美”“我国古代雕刻又一伟大宝库”等盛誉。地方志自古便有“一邑之志，载一邑之事”“志信物也”等特点。从读志用志的角度，借助《安岳县志》及相关志书，对安岳石刻（寺观）进行略考，对厘清其历史状况，具有探索意义和方法论意义，甚至能为我国著名石窟（刻）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志书 寺观 安岳石刻 安岳县志

一 从《安岳县志》略考安岳石刻

地方志不仅为一方全史和一地百科全书，而且具有权威性，具体表现在：体例独特、官书官修、资料采集广博等。仅以该邑之清康熙《安岳县志》的资料采集来源为例，便涉及《一统志》《华阳国志》《四川通志》《历代会典》《尔雅》《唐史》《宋史》《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文献通考》《翰墨全书》《方輿胜览》《大学衍义补》《古今诗刻》《经世宏词》《古今碑志》《历朝捷录》等约20种文献。据此，出自地方行政官员或硕儒的志序中，便有“邑有志，犹国有史。凡一邑之志，一邑之古俗、民风、大政、大事俱悉焉”“志以志一邑之事”“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一邑大观”“志信物也，信于独，可竖揭于昭昭；信于同，可垂鉴于永永”等说，并把它作为修志所强调的客观理由。

四川安岳建制历时1400多年，古称普州，自宋代以来，修志代代赓续，曾六修地方志书，其中清代便有四修。尽管如此，囿于历史条件局限，如交通及交通工具、通信的欠发达、落后，加之缺乏专业的文物保护机构通过文物普查得出的具体数据，因此安岳石刻分布的记载，包括系统性的存史，主要依靠县志设寺观篇或《寺观志》专题来完成。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讨论的寺观，并非土木结构意义上的寺观，而是佛教石刻特殊形式的寺院。其表现是，以岩石为载体，或凿洞，或开窟，或辟龕，造像其中，供人顶礼膜拜，以体现像教作用及历史、艺术价值。故在旧志中，安岳石刻分布的一大特点，便是依托这种特殊形式的寺观而存在。由此，从县志的《寺观志》中，梳理出安岳石刻（寺观）不同时期的分布概况，具有客观性、科学性。

就旧志而言，安岳县志有宋刻本《普慈志》、明刻本《安岳县志》、清刻本《安岳县志》（康熙、乾隆、道光、光绪本）；就新志而言，安岳县志有1993年本《安岳县志》、2011年本《安岳县志》。在这些志书中，关于寺观的记录，对于我们认知安岳石刻的客观存在和具体分布具有“信物”意义，颇值得梳理和进行比较研究。下面，按志书刊刻印成时间的先后为序记述。

其一，宋刻本《普慈志》。该志为南宋嘉定时期（1208—1224）所修的木刻本。据《宋史》卷240《艺文志三》载，《普慈志》由普州知州杨泰之主修，共30卷，开安岳县事记载之先河。因其散失无存，无法窥其全貌，只能从有关文献、特别是明万历《安岳县志》的序言中知道它的存在及价值。康熙《安岳县志》艺文“古碑遗目”曾收录杨泰之为《普慈志》撰写的序言。

遗憾的是，该序言在清康熙时便散佚无存了。

其二，明万历《安岳县志》。该志是安岳历史上第一本以“安岳县志”命名的志书，系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所修的木刻本，由被誉为“邃学宏才”“名杰”的安岳知县李奇英主修。这应该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县志，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惜散佚无存，只能从清代所修该邑志，尤其是康熙版县志知道它曾经存在。

其三，清康熙《安岳县志》。该志是清代第一本安岳县志，系邑令郑吉士获得明万历刻本《安岳县志》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前重加修辑，由本邑孝廉（举人）周于仁纂，约8万字。因郑吉士乃一官摄安岳、乐至两县，故修《乐安县志》（共3卷，其中前2卷为《安岳县志》，后1卷为《乐至县志》），但功未克成。继任姚孔镛进一步推动，并为该志撰序。后任知县程璲于康熙五十八年踵其事，并于康熙六十年梓行。该志仅存两套，一套藏北京图书馆，另一套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弥足珍贵。1984年，安岳县志编纂委员会在北京图书馆复印该志，并请工于书法的蔡蕴辉刻蜡版油印200册；2013年，安岳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重印500册。由于《普慈志》和明万历《安岳县志》散佚，清康熙《安岳县志》客观上成了安岳县现存的第一本县志。

康熙《安岳县志》虽有局限，甚至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张松孙、朱纫兰在乾隆《安岳县志》卷首《凡例》中批评“周于仁无燕许才，逞胸臆见，体裁不依史例叙次，复多踳驳，挂一漏万，无征信难信”，甚至指其艺文“滥伪收入”“词句俚鄙”“轻重倒置”。尽管如此，该志“寺观”仍沿袭明万历《安岳县志》的记载方式，正如附言：“按旧志云，普（州）寺庵甚多，稍隘不称者不载。今查境内如蟠龙寺、宝庆寺、集福寺、观音寺，不甚狭小皆未载入。则其他孤庵小庙之遗漏，必多可知矣。今概其旧，不敢妄增致繁冗也。”此附言，至少传递了3个重要信息：一是古普州（今安岳）的寺观甚多；二是忠实前志即明代万历《安岳县志》记录的寺观；三是遗漏的客观存在，如净慧岩，建于唐乾元年间，且具一定规模的僧舍遗迹，尽管艺文中辑录有宋人白麟撰写的《净慧岩铭》。

康熙《安岳县志》辑录寺观96个，其中寺85个、观11个，足显安岳石刻分布之广，真所谓“罗布乡村”。但从整体上看，其表述散乱，缺乏科学的分类，即或按时空分，或按题材分。此外，整个记录的信息或过于简单，如规模宏大的卧佛寺（宋时为卧佛院，下同），仅有一句“治北四十里”；或多残缺，如草堂寺、大山寺、玉金寺、天龙寺、兴隆观、元妙观、五龙观等仅有寺观名而不知其方位；或有失误，如宝相寺、卧佛寺的距离等。但也不乏用心之处，即努力注明地名方位并注录具体的位置。如记述隐静寺，既注出其位于县东百里，又具体到帽盒山之右及一名马家寺；记述报国寺，既注出县南24里，又具体到有12峰；记述孔雀寺，则具体到孔雀山之绝顶处。对于那个交通不便、信息不畅通、记录手段单一、经济落后的时代，知志者何容易哉！尽管我们不能苛求古代修志者去做田野调查或者文物普查，更不能奢望他们能够留下对安岳石刻研究的“大数据”，但是做实求是的评价却是必要的。

除在寺观志中介绍寺观分布情况之外，康熙《安岳县志》艺文篇载有与之相关的记、铭、古碑遗目、记游诗，如宋代白麟撰《净慧岩铭》以及古碑遗目《栖岩山寺赞铭序》《老君应见碑》《普慈志》《小千佛院记》，明代杨名撰《道林寺增修台堦记》、杨瞻撰《真相寺重刻摩岩古字记》、工烈撰《敕赐兴修天庆观记》。较之清乾隆、道光《安岳县志》，这些文献存录尽管算不上丰富，但传递了寺观沿革等相关信息，特别是重修（建）及曾有的规模，突出了重要寺观的影响，弥补了寺观分布简介的不足，并为后志的编纂或续修提供了参考、借鉴。

其四，清乾隆《安岳县志》。该志系乾隆五十一年（1786）刻本，上承康熙本，下启道光本，有着特殊意义。该志由潼川知府张松孙修，安岳知县朱纫兰纂。该志在清康熙《安岳县志》

的基础上增修,约16万字。其卷首《凡例》称:“详考核而广搜罗,卷帙既富,两倍旧志。”该志具有分类细、信息量大的特点,强调“邑之寺观亦独盛于他邑”的特色。其刻本仅存两部,分别藏于四川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85年,安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在成都复印该志,并请蔡蕴辉照本刻写,翻印100部;2013年,安岳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重印500套(每套两册)。

乾隆《安岳县志》设《寺观志》,共收录寺、观、庵、宫、庙、阁81个,其中寺68个、观8个、庵3个、宫1个、庙1个、阁1个,分类科学,即根据寺观的多寡按地理方向以东西南北分类,一目了然。在所辑录的68个寺中,治东(含东北)28个、治西(含西南、西北)5个、治南21个、治北8个;未明确方位的有2个(梧杨寺、普庆寺)。数据显示,安岳的寺观主要集中分布在治东和治南方向,这为之后的文物普查提供了重要线索。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著名的安岳卧佛寺,该志在康熙《安岳县志》“治北四十里”的基础上增加了“石像森然,今未修”7字,信息量增大。该寺为人所不知,包括专业著述《安岳卧佛院考古调查与研究》^①等亦未收录。至于安岳寺观所体现的文化氛围和昌盛发达的原因,乾隆《安岳县志》卷3《寺观志》章下序作了回答:“普慈素号仙灵窟宅。宋明以来,高僧羽士著名者时不乏人。其琳宫古刹,俱建于山巅水湄白云深处。学士大夫有探幽选胜之癖者,每低徊留之不能去。歌咏记序跋,较他邑独多。况自无际禅师之后,数传而至慈量,犹能持慧定力,被忍辱铠,阐法苦行,振其宗风。宜乎,邑之寺观亦独盛于他邑也!”

除在《寺观志》中介绍寺观的分布情况之外,乾隆《安岳县志》承袭了康熙本通过记、诗等形式完善寺观内容的方法,但分类更科学更具有系统性,记和诗的体量(信息量)更大,成为道光本、光绪本的范本。所谓分类更科学,即记述归类在“寺观中”,随寺观而编,一目了然;所谓体量(信息量)大,即录存的记有18处之多、诗若干,皆为明清地方官员及硕儒所撰。这些记(铭)少者两三百言,多则八九百言,依次为:苗衷撰《道林寺碑记》、杨名撰《道林寺增修台堰记》、汤绍恩撰《重修道林寺佛殿记》、邹升元撰《重修道林寺记》《重修道林寺阶墁记》、徐观海撰《大佛禅院碑记》、颜公辅撰《修教中寺记》、任文翌撰《重修教中寺金像阶级山门记》、冯世雄撰《真相寺石观音像记》、冯俊撰《真相寺圆觉洞记》、杨瞻撰《真相寺重刻摩崖古字记》、周于仁撰《重修罗汉寺记》、徐观海撰《国清寺建坊记》、王英撰《无际禅师塔铭》、王应鵬撰《万寿寺重修大士宫及两廊记》、工烈撰《敕赐兴修天庆观记》、姚孔镛撰《川主庙装铁地藏像并修佛殿记》、徐观海撰《观音阁记》。这些记(铭)及诗,传递了若干与寺观密切关联的信息,包括撰写者的身份,如前国史总裁王英等。这些记及诗,对于深刻认知安岳石刻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可以作为安岳石刻资源的一种深度开发,或编印成册,或做艺术墙,或作为安岳石刻申遗的佐证,或作为深度诠释安岳石刻旅游的一部分等,古为今用。

其五,清道光《安岳县志》。该志为道光丙申年(1836)刻本。2017年,安岳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重印1000册。该志由安岳知县濮瑗总裁,国史馆议叙知县周国颐编纂,除卷首外共16卷,约28万字,系《安岳县志》旧志中字数最多的一部。有此规模,得益于知县濮瑗的爱志、读志、用志。从其序知道,他下车之初便读《鹤平太守志》,听讼之余读《仙山孝廉志》,甚至有若干举措,“用是数年来,有所见闻,则随手抄录存之,以待补遗”。也得益于书院山长周吉卿及纂修者的请缨修志。

道光《安岳县志》设寺观志,辑录寺、宫、观、庵、阁89个,包括已废寺观,其中寺72个、

^① 秦臻等著:《安岳卧佛院考古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

宫1个、观11个、庵3个、阁2个。它的分类不及乾隆《安岳县志》明晰，缺乏标准，比较随意，但却多注明行政属地，有利于按图索骥。其辑录寺观的原则，结尾处有说明：“邑中寺观甚多，此特录其较盛者。有邑、郡、省三志所已载者，虽废亦录存，古迹也。此外，孤庵小庙势难备载。”

值得肯定的是，道光《安岳县志》寺观志像乾隆本一样，强调“邑之寺观特盛”的特色，即录存有大量的记及纪游诗。其记多达24篇，依顺序具体为：王应鹄撰《万寿寺重建大士宫及两廊记》、冯世雄撰《真相寺石观音像记》、冯俊撰《真相寺圆觉洞记》、徐观海撰《国清寺建坊记》、王英撰《无际禅师塔铭》、徐观海撰《大佛禅院碑记》、邹长源撰《仙桥寺记》、苗衷撰《道林寺碑记》、杨名撰《道林寺增修台墀记》、汤绍恩撰《重修道林寺佛殿记》、徐观海撰《重修道林寺阶墁记》、颜公辅撰《修教中寺记》、佚名撰《报国寺览胜记》（节录）、于汤撰《舍常住自叙碑记》、邹长灿撰《补修观音寺记》（节录）、汤佐撰《宝庆寺源流记》、王炳瀛撰《宝庆寺补修碑记》、周于仁撰《重修罗汉寺记》、谭言葛撰《华严寺重修碑记》、汤绍恩撰《千佛寺碑记》、宝可撰《龙门观增建胜景记》、工烈撰《敕赐兴修天庆观记》、邹长源撰《天庆宫记》、徐观海撰《观音阁记》。这24篇记，既存录或强调了乾隆本的14记，又新增了康熙至乾隆这个时段地方官员和名士鸿儒新撰写的10篇记。在新增的《仙桥寺记》《报国寺览胜记》中，还传递出杜甫曾流寓宜游安岳及杨升庵为安岳报国寺篆额的信息；从《题菩提寺大通和尚壁》中，尚可读明文渊阁学士赵贞吉的诗。这些鲜为人知的信息，无疑也是安岳石刻旅游开发的亮点之一。

其六，清光绪《安岳县志》。该志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准确的志名为《安岳续志》增修本），系安岳清代最后一本邑志。2017年，安岳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重印。

光绪《安岳县志》由安岳知县陈其宽修，举人邹宗垣纂，约9万字。因该志定位为增（续）修，故所设卷2《寺观志》为“续”，开篇即说明“旧志有者不录”，只是对前志未录且新发现的寺观做了补充，共33个。其中寺23个、观2个、宫1个、洞1个、庵6个。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相当于在前志的基础上做了一次不小的文物普查而获得新的寺观数据。其新增的“记”（序、小引）有15篇，存录了一个时段有关情况的变化，具体为：巨崖氏撰《东林寺重修白塔碑记》、周文席撰《增修云居山真相寺记》、朱向隆撰《建修真相寺记》、罗心田撰《培修栖岩寺记》、王应鹄撰《重修白云山宝相寺记》、陈瑞撰《报国寺记》、谭言葛撰《重修高山寺记》、邹绍观撰《增修集福寺记》、邱开来撰《五谷灵官二神像记》、李廷燮撰《培修道林寺记》、任文山撰《补修教中寺记》、邹绍观撰《大月寺落成序》、陶绍绪撰《金轮寺小引》、郭凯光撰《玉皇观记》、吴琢璞撰《创修三圣宫碑序》。其记游诗有《宿国清寺》《游国清寺》《游龙兴寺》《游天台寺》《游宝庆寺》等。

其七，1993年本《安岳县志》。该志为首轮新方志，开安岳县新修县志的先河。该志由安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1993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10万字。较旧志的“寺观”，该志第一次将安岳石刻升格为篇，设概况、主要石刻、保护管理3章，计约3万字。石刻篇首次对安岳石刻作了概述，并对安岳58处主要石刻做了详细介绍，包括卧佛院、千佛寨、圆觉洞、毗卢洞、华严洞、玄妙观、茗山寺、净慧岩、黄桷大佛、高升大佛岩、孔雀洞、安堂寺、塔坡石刻、三仙洞、狮子岩、菩提寺、上大佛、朱家经堂、石锣沟、佛慧洞、青竹寺、云峰寺、清流翰林洞、西禅寺、佛洞岩、永隆佛耳岩、圣水寺、菩萨湾、三教寺、封门寺、白塔大佛寺、龙西毗卢沟、新庵子、大月寺、城郊大佛岩、城北佛耳岩、佛洞寺、下大佛、宝庆寺、岩观音、三娘庙、金鸡寺、寂光寺、香吉寺、宝石庵、石鼓千佛岩、老君岩、清明寺、佛岩湾、大菩萨、半边寺、搥石岩、菩萨湾、赖佛岩、花石岩、大佛山、共和老君岩、朝阳洞石刻，对其他零星石刻点做了简

介,体现了1984年全县文物普查的重要成果(文物普查包括地面文物——石刻、古建筑、古文化遗迹、古寨、近现代重要史迹;地下文物——古墓葬、古生物化石;馆藏文物,特别是对石刻的登记建档)。这些石刻点的著录,成为安岳石刻历史的客观记录,大致对应了安岳县旧志记述寺观分布的情况,尽管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导致地名出现某些差异,但提供了石刻普查的重要线索。同时,完善了旧志未详细介绍的石刻点,如规模宏大的卧佛院仅有康熙《安岳县志》“位于治北四十里”之轻描淡写,乾隆《安岳县志》仅有“位于治北四十里,石像森然,今未修”的记述,从而弥补了遗珠之憾,为新一轮的文物普查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八,2011年本《安岳县志》。该志属于新编《安岳县志》的续修本。该志由安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2011年由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180万字。该志在前志基础上,不仅设立石刻篇,而且设有与石刻相关的文物与管理篇,体现文物事业的与时俱进、蓬勃发展。文物与管理篇分文物概况、文物升级申报与命名、文物管理与保护、文物研究与利用、机构5章,总结了1984年、1987年、2009年文物普查的成果,包括对安岳石刻档案的进一步完善与复查内容,故比前志记录更加完整、更丰富,为安岳石刻大数据的构建提供了保障,并为安岳石刻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注入了新的活力。

2011年本《安岳县志》石刻篇设两章: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对安岳全国级文物、省级石刻进行了详细介绍,体现该志内容的地域特色。其中的《安岳主要石刻一览表》,结合安岳县三轮文物普查结果及国家、省、县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的实际情况,按序号、单位名称、时代、题材、级别、地址、公布日期等要素,特别强调以安岳石刻级别的分类,即按石刻级别(全国、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保护单位)分类,颇为清晰,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

为体现统计的完整性,包括最新田野调查结果,本文采用安岳县文物局最新的统计数据(包括《安岳主要石刻一览表》所列148处摩崖石刻单位),即236处摩崖石刻单位。其中,全国级文物保护单位有卧佛院摩崖造像及石刻经文、毗卢洞摩崖造像、圆觉洞摩崖造像、千佛寨摩崖造像、华严洞摩崖造像、茗山寺摩崖造像、孔雀洞摩崖造像、玄妙观摩崖造像8处(由于木门寺是以古建筑申报的,本文未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18处。此统计分类科学,横不断线,既符合行业管理的要求,又为搭建安岳摩崖石刻大数据平台提供了良好基础,有利于安岳摩崖石刻最新调查内容的补充完善,有利于安岳石刻的合理科学开发。

二 从其他志书文献中略考安岳石刻

除《安岳县志》对安岳石刻(寺观)的记载之外,其他志书文献亦有不同程度的记载,虽然有些碎片化,但却透露出安岳石刻之古、多、精、美,弥足珍贵。按出刊(版)时间为序,略述如下:

其一,《舆地纪胜》。宋代王象之所撰,被列入“宋元地理志丛刊”^①。第158册“普州”中,有对安岳石刻的记载,如“千佛院,在城东灵居山,寺上有圆龟洞、葛仙洞、翼然亭,今名真相寺,皆镌石为佛像,形容其古”;如“宝相寺,在安岳县,有石镌三大像,覆以层阁”等,足现安岳石刻之古、之宏。

其二,《四川通志》。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常明、杨芳灿等修纂,合计226卷,400余万字,既是四川现存第七种旧省志,又是正式成书刊行的最后一种,还是最具规模的一部通(总)志,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志卷42《舆地·寺观》中,介绍了安岳县的陈林寺、万寿

^① 李勇先点校:《宋元地理志丛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

寺、天庆宫、菩提寺、慈云寺、教中寺、国清寺、真相寺、古龛寺、东林寺、栖霞寺、报恩寺、道林寺、木门寺、天台寺、天庆观、梓潼观、净慧岩 18 处寺观，其中对国清寺、真相寺、天庆观、净慧岩 4 处寺观的介绍较为详细。

其三，《新修潼川府志》。清代四川最后一部府志，由阿麟修、王龙勋等纂，55 万字。该志将寺观内容归置于卷 6《舆地志》，介绍了安岳县的国清寺、木门寺、万寿寺、栖岩寺（今废）、道林寺、寂光寺、真相寺、天台寺、古龛寺、大佛寺、菩提寺、宝庆寺、孔雀寺、玉泉观（今废）、天庆观（今废）、龙兴观（今废）、观音阁 17 处寺观，其中对国清寺、木门寺、道林寺、真相寺、大佛寺、宝庆寺 6 处寺观的记述较为详细。

其四，《安岳县乡土志》。编成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897），约 5 万字，未刊印，善本，稿本现存四川大学图书馆。该志由安岳县知县高铭箴鉴定，举人张光溥总纂兼分撰，即根据《安岳县志》（道光、光绪本）作增辑。其中目录未列《寺观》，内文仅著录万寿寺、栖岩寺、宝相寺、真相寺、石华寺、牛王寺 6 处寺庙，对真相寺作有介绍。

其五，《内江地区文物简志》。内江地区文化局于 1983 年 12 月编，内部资料，约 2 万字。在摩岩造像及石刻栏目中，著录有安岳毗卢洞石造像、圆觉洞摩岩造像、华严洞摩岩造像、千佛寨摩岩造像、孔雀洞摩岩造像、大佛岩摩岩造像、卧佛院摩岩造像及石刻佛经、茗山寺摩岩造像、玄妙观道教造像、庵堂寺石刻、大月寺石刻、塔坡石刻、净慧岩摩崖造像、三仙洞摩岩造像、佛慧洞摩岩造像 15 处造像，约 6000 字，均配有图片。除被介绍的安岳石刻造像占整个栏目的 3/5 之外，在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栏目中，介绍了木门寺无际禅师亭、文庙、道林寺、教中寺、奎星阁 5 处，约 2000 字。

其六，《四川省志·文物志》。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1999 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08 万字。其第 4 章《摩崖造像、题记、画像及其他造像》，分别著录有安岳千佛寨隋唐造像、玄妙观唐代造像、卧佛院唐宋造像及藏经洞刻经、华严洞宋代造像、毗卢洞宋代造像、茗山寺唐宋造像、圆觉洞唐宋造像 7 处代表性造像，约 5000 字，均配有照片。安岳石刻居该章之冠，著名的大足石刻介绍也仅有 6 处、闻名的广元市、巴中市石刻介绍仅有 3 处，足见古、多、精、美的安岳石刻在巴蜀石刻艺术中的突出地位。

结 语

归纳起来，本文借助的志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旧志与新志，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出版及之后出版的志书；一类是综合志与专志，综合志为通志、府志、县志三级志书，专志为综合志之外的志书。在方法上，通过客观的对比，让文献资料（志书）“说话”，体现出读志用志的实际意义。这对于探索如何运用志书记述，就我国颇具代表性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刻等石窟（刻）作区域性的对比研究，无疑提供了一个新角度、一种新思维、一种新方法，有助于我们对考察对象有一个渐进式的认知，从而拥有更大的信息量。

（作者单位：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本文责编：詹利萍